

文学： 走向现代的履印

文史哲编辑部 编

文史哲丛刊

 商务印书馆

文史哲丛刊

文学：走向现代的履印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走向现代的履印/文史哲编辑部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

(文史哲丛刊)

ISBN 978 - 7 - 100 - 07537 - 4

I. ①文… II. ①文…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4207号

文学：走向现代的履印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537 - 4

2011年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8

定价：30.00元

出版说明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迄今已走过六十年的历史行程。

由于一直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文史哲》杂志甫一创刊便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她所刊布的一篇又一篇集功力与见识于一体的精湛力作，不断推动着当代学术的演化。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这份杂志密切相关。《文史哲》杂志向有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文章按专题结集成册的历史与传统：早在1957年，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以“《文史哲》丛刊”为名，推出过《中国古代文学论丛》、《语言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今者编辑部再度与商务印书馆携手，推出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所收诸文，多为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望学界垂爱。

文史哲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0月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 问 孔 繁 刘光裕 丁冠之

韩凌轩 蔡德贵 陈 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周广璜 刘京希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建 王学典 刘 培 刘京希

李 梅 李扬眉 宋全成 陈绍燕

范学辉 周广璜 贺立华 曹 峰

目 录

先驱者研究

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

- 论“野草精神”之一 李希凡 / 3

历史价值范畴里的符号选择

- 鲁迅批孔新议 孔范今 / 26

-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洪峻峰 / 42

怀念仿吾同志

- 《成仿吾文集》代序 丁玲 / 62

- 沅君幼年轶事 冯友兰 / 69

留学背景与建设渴望

- 试论现代作家的建设意识 郑春 / 72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

- 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柳传堆 / 86

追寻与反思

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

——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 李新宇 / 105

20 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之回顾 李 岫 / 124

青春、历史与诗意的追寻和质询

——王蒙与米兰·昆德拉比较研究 张志忠 / 149

战后 20 年文学论纲 黄万华 / 169

寻根小说的美学追求 张学军 / 187

世界性“老舍热”与各民族审美方式的异同 宋永毅 / 199

改革与骚动

改革与传统道德的关系

——改革题材文学探幽之三 沈敏特 / 217

商品观念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 杨守森 / 229

论改革中作家自我超越的难题 贺立华 / 239

作家和他的文学创作 莫 言 / 252

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精神风貌 谭好哲 / 261

中国第三代诗歌后现代倾向的观察 孙基林 / 273

问题、主义与方法

现代性与文学性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张 华 / 291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牛运清 丛新强 / 312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

——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郭延礼 / 332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

——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吕家乡 / 361

一个“撒谎”故事的流布、变异与改写

——《牧童与羊》、《狼来了》与《三声枪响》 张 宁 / 385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 李 玲 / 402

精神生态视野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 温奉桥 李萌羽 / 419

后 记 文史哲编辑部 / 439

先驱者研究

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

——论“野草精神”之一

李希凡

一

《野草》，是鲁迅自己认为可以“称为创作”的“五种”^①之一。它写作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历时一年半，共23篇。鲁迅在谈到《彷徨》和它的写作背景时说：

《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

^① 《自选集·自序》。

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从此我们得知，在一定意义上，小说集《彷徨》的题名，也是鲁迅对自己这段时间的思想状态的解剖与总结。不过，如果从这段时间的思想情绪的艺术体现来看，《野草》较之《彷徨》，似有着更鲜明的轨迹、更强烈的色彩和声音。

对于《野草》，历来是有些不同看法的，特别是由于它在艺术表现上隐晦，曲折，而且又采取了感情浓烈的诗的形式，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所以对不少作品的理解就很不一致。有人说，《野草》是表现了鲁迅在黑暗重压下的“悲凉孤傲之感”；有人则说，这些作品表现出来的作者的矛盾和痛苦，“反映着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立场在他那里发生着动摇以及他自己对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有人甚至认为，《野草》是鲁迅“内心深处阴暗的心灵的暴露”。

鲁迅说得好：“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①，“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文，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②；而且“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③。

我们所以不同意前面所引的那些意见，觉得它们未能正确理解和评价《野草》的思想内容，甚至有片面或歪曲之处，也就是由于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②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③ 《且介亭杂文·序言》。

它们在作出那些论断的时候，没有兼及社会，兼及全篇全文，紧紧把握住鲁迅的思想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战斗一定有倾向。”^①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和时代共同着脉搏，哪怕是所谓“小感触”，也必然有着所处“社会状态”的“确凿”的印迹。

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这段时间，在我国革命史上，既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酝酿时期，又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时期。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新的政局也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特别是1925年爆发的以“五卅”为标志的反帝爱国运动，更进一步反映了我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统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显示了革命高潮的正在到来。

当然，在鲁迅生活着的北方——军阀大本营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反动势力却还在作垂死挣扎。他们不断地镇压进步的学生运动。从1924年5月北京女师大风潮的兴起，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这段时间，是“五四”以来北京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不仅北洋军阀的政治统治日益腐朽，而且在思想战线上他们也加紧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压迫，以反对所谓“过激主义”和“赤化运动”为借口，先后查禁了《新青年》以及其他许多进步报刊。而代表封建复古势力又披上“学贯中西”新装的《学衡》派却在南方应运而生；自称新旧“调和派”的章士钊的《甲寅》杂志，也于1925年在北京复刊，和《学衡》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在全

^① 《且介亭杂文·序言》。

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怒潮中，扮演了帮凶、帮闲的角色。与此同时，新文化阵营的内部分化也日趋明显——即“新青年”团体的解散，革命力量的南下，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文人的转向，直到胡适在幕后支持的以陈西滢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出而与鲁迅对抗，一时间阴云密布，表现了“五四”高潮退后，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一翼的思想文化战线，仿佛又失去了核心的领导力量，转入低潮。

如果从“编年的文集”来看，在这写作《野草》的同一段时间里，鲁迅的战斗生活空前紧张。除去一部分译作，如《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他还写下了各种文体的作品 180 余篇，其中包括小说集《彷徨》11 篇中从《长明灯》开始的后 7 篇，《华盖集》的全部杂文，《坟》和《华盖集续编》中的部分论文和杂文，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前 5 篇，《两地书》中的“第一集”《北京（1925 年 3 月至 7 月）》。在社会工作中，鲁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中大等学校任教，并参与了（有的也可以说是领导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周刊》、《乌合丛书》等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阅读了大量的文学青年的来稿，为“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而做着呕心沥血的培养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鲁迅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并为共产党员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写了《前记》^①。他介绍说：“那主张的要旨，在推倒旧来的传统，毁灭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

^① 《集外集拾遗》。

今的活艺术来。……誕生日就是十月，在这日宣言自由的艺术，名之曰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在这里，我们当然还没有能看到，鲁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苏联当时的文艺，但这段话显然是反映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热情期待。我们都知道，鲁迅后期（从1927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是突然跳出来的，而是前期斗争中就已有了变化和积累，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些论著中，如《坟》中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明确地表现了他的阶级论的因素在增长，而世界观中的进化论思想，却已发生了严重的动摇。这当然不只是由于他取得了书本的知识，更主要的因为他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五卅”运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这一系列的尖锐的政治斗争，深深地启示和教育着他，而他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和革命群众、进步学生在一起，终于使他在“直面惨淡的人生”中，得出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使用“别种方法的战斗”的绪论。

但是，由于这时的鲁迅，毕竟还没有同革命的主力军取得实际上的结合，没有真正接触到革命的中心，也还不能理解当时工农大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他自己在黑暗的重压下，又经受着“现代评论”派的诬蔑和围攻，甚至是章士钊的无理迫害（非法免去鲁迅教育部金事的职务）。他满腔悲愤，扶病战斗，眼中所见又是思想文化领域复古反动的浊潮，所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使他产生了“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孤军作战的思绪。而且如上所说，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战友们不断地离散聚合，变化多端，使他曾坚信过

的进化论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旧的世界观在严重动摇，而新的武器、新的战友们在哪里呢？这一切，在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的主题和主人公的典型性格里，得到了深刻的反映。但从作者的主观世界来看，这一时期的思想在苦闷中所经历的激烈斗争，应当说，更直接的是具现在《野草》的诗的境界里。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1924年至1926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怎样理解这“难于直说”和“措辞含糊”呢？是由于畏惧黑暗的重压，而不敢直说吗？这同时期的三本杂文集——《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对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和它的帮凶帮闲们的深刻揭露和猛烈鞭挞，不仅表明了他敢于直说，而且表现了他敢于直面杀人的刽子手，进行无情的口诛笔伐。因此，我以为，这所谓“难于直说”者，主要是指作者在战斗中艰苦求索的内心世界——即他所说的“随时的小感想”。这些“小感想”，虽然也曲折地反映着黑暗的现实，但它们更多的是显示了黑暗现实的压力在作者的内心世界所激起的感情的波澜，以至哲理的探求。它们在形式上，尽管凭借着诗的意境的创造，借助于隐喻、讽喻或象征的手法，而在思想主题上，却离不开现实与理想（实有与虚无）、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的矛盾，在一个伟大寻求者心灵深处的搏战。

二

在《野草》中，作者围绕着上述思想主题，抒发了他所感受和探索的艺术境界的，有这样五篇作品：《影的告别》、《求乞者》、《希望》、《过客》、《死火》。毋庸讳言，贯串着这些作品的，的确有一种灰暗的调子，或失望与“绝望”的声音，而这种调子和声音，也分明显着作者所承受的浓重的黑暗重压之感，只不过它们往往渗透着哲理的沉思，展现在对社会、对人生命运的探索的奇特、复杂的形象世界里，不是一眼就能看懂的。

《影的告别》，写的是人的影子，不愿意再跟随人了，向人来告别。当然，“影”很明白，离开人，它就不能存在——或者被光明吞没，或者被黑暗灭亡。何去何从，“影”还是几经踌躇和反复的：“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但时候近了，不容“影”再犹疑徘徊，它宁愿走向无地可以彷徨的黑暗，被黑暗吞没，也不愿苟活偷生在明暗之间。于是，“影”下了狠心，最后来向人告别了，并给人以这样的诀别词：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如果把“影”的诀别词加以丰富和引申，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什么理想的光明的东西留赠给你，因为我所有的是黑暗和空虚。这黑暗只能被你的光明所消失，这空虚也不会在你心中占